

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并重的和谐教育模式思考 ——从斯诺“两种文化”的论说谈起

侯奇焜

(湖南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斯诺(C.P. Snow)于1959年在英国发表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指出当时英国社会中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隔阂与互不理解,呼吁社会重拾人文和科学并举的文化态度,目的是鼓励人们在教育领域采取积极行动。文化与教育本是紧密联系的关联领域,文学文化氛围对浮躁或功利化教育现象有抑制和改造作用,斯诺的观点对当前中国大学教育有可借鉴之处。通过引证现代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提出大学教育向培养崇尚文学和科学两大精神的和谐教育模式转变的途径。

关键词: 斯诺;文学;科学;文化;教育;和谐

中图分类号: G4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4-0179-05

斯诺(C. P. Snow) 1959年5月在剑桥大学发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里德演讲,并提出两种文化的划分: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和自然科学家的文化,即“文学的文化”和“科学的文化”,强调这两种文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已变成互不沟通的两个极端,且彼此相距越来越远。有学者将此次演讲看成“西方最引人注意的一次文化评论”,而且是“西方在五十年代以后最重要的一场文化评论”^{[1](25)}。此后,英国发起一场关于两种文化的激烈论战,以至于斯诺1963年又专门撰文《再看两种文化》,进一步发展和修正其观点,明确将文化概念分为“人的思维意识”和“有关技术层面”两层含义,主张文化应包含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想。里德演讲的巨大影响力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正如19世纪人文主义的倡导者红衣主教纽曼(John H. Newman)面临的形势,“在英国工业革命兴起之后,科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日益上升”,“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教育理想使英国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2](144)}。正因为如此,斯诺的里德演讲,希望通过发掘文学和科学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呼吁当时的英国社会重拾文学和科学精神并举的文化态度,反映出在科技发展且物质膨胀时,人们渴望文学精神的诉求和通过文化教育满足社会道德需要的呼声。当前,中国社会同样面临如何保持悠久文化传统,建设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中国文化模式的问题,从斯诺的里德演讲及其辩论中,我们或能得到某些新思考。在文化重建过程中,人的教育势必扮演重要角色,斯诺演讲

的主旨如与人的教育结合,或可打通文学和科学文化间的隔阂,建立新型的和谐教育模式。

一、两种文化之辨

关于“两种文化”的内涵,斯诺解释道:“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是白天与科学家在一起工作,晚上则与一些文学同事在一起。事实就是这样。当然,在科学家与作家当中,我都有知心朋友。正是由于我生活在两种群体之中,或者更进一步说,经常与这两种群体打交道,使我在写文章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能一直思考这一我称之为‘两种文化’的问题。”^{[3](2)}接着他又说:“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被分化成两级群体。……在这两级群体中,一级是文学知识分子……而在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3](3-4)}回顾斯诺的生平,他同时是作家和物理学工作者,正是文学和科学两种文化身份的重叠让斯诺深刻地洞察到英国乃至欧洲和整个西方在科学革命过程中人文与科学精神的日益割裂,他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将它们隔离,造成彼此间缺乏必要了解,并最终导致“非科学家”与科学家相互存有偏见,因而整个社会文化分裂为两极。他在《再看两种文化》中说:“数字‘二’是个非常危险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是一个危险的方法的原因所在。把任何事情一分为二的企图多少

都让人有所怀疑。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作进一步的完善,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表达方法,它稍微超出某些有力的隐喻,但又远小于某种文化结构图。两种文化的表达正好符合上述两个要求,而过分精细的分类将无助于体现其真实价值。”^{[1](8)}笔者认为,斯诺的上述表述可从以下三方面理解:首先,斯诺将整个文化范畴分为文学和非文学(科学)两种类型。第二,此种划分是否体现辩证法的二元对立法则,二分法与有关文化话题的争论是否存在联系。第三,在文化二分法之外,斯诺仍认为存在更完美表述的可能,并有必要继续进行探索性尝试。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将斯诺的文化二分法理解成在两种极端间寻求沟通平衡的折中。一方面,辩证法的二元对立性使斯诺看到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相互隔阂的危险,同时也害怕一分为二的做法会陷入相对性绝对化的境地而令人怀疑,另一方面,斯诺试图摆脱二元辩证法的束缚,向往寻求更完善的表达而不得所愿,最终不得已无奈放弃努力。两种文化的概念阐释令斯诺处于辩证法矛盾和文化界限区分不明朗的双重困惑之中。

斯诺的初衷是关注当时英国社会发展中人文主义关怀的缺失,希望通过演讲唤起人们强化文学文化教育,后因其在当时的重要社会地位,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评论浪潮。有人支持他的观点,有人不置可否,也有人批评反对。利维斯(F. R. Leavis)对斯诺的批评较有代表性:“斯诺是个凶兆。他是个危险信号,因为虽说自己本身无关紧要,但对于大西洋两岸的公众,他已成了一位策划者和哲人……真正卓越的思想,当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本身……斯诺与时代的关系却是个另类;它并不是以洞察力和不自觉地作为特征。他不清楚自己的意思,也不知道自己不清楚这回事。”^{[4](28-29)}利维斯贬低斯诺的公众地位,质疑斯诺以个人的能力是否有足够资本充当时代思想发言人的角色,并对公众受到斯诺演讲的影响而表现出忧心忡忡。此外,在评价斯诺的里德演讲内容时,利维斯还讽刺地嘲弄和挖苦:“《两种文化》中展现的思维特质完全缺乏和令人尴尬的粗俗风格使我头一次能认识到一种表达的味道能多么清淡……我承认,中小学校长把它当作初级批评的文本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风格批评,……批评思想、实质、自命不凡。”^{[4](30)}在利维斯眼中,斯诺的演讲稿缺乏深刻独特的观点和思考,对文化的界定比较模糊,风格、思想、本质都成为批判的对象,而斯诺本人的清高更让他觉得反感。

面对激烈争论,斯诺在四年后发表了《再看两种文化》,试图对前文做出一些修正和说明。他首先强调了里德演讲中谈论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与不理解只是

希望鼓励人们在教育方面采取行动,更需关注的重点是演讲后半部分提出的由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其次,他解释了文化的定义,以及为什么选择两种文化作为演讲主题。再次,他联系美国当时的教育体制,分析比较了英美教育制度的异同。最后,作为当时英国大的社会背景,工业及科学革命的影响导致个体越来越专业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产生两种文化的原因所在。

斯诺先后两次关于“两种文化”的论述不禁引发我们对当今社会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平衡发展问题的反思。随着科技水平和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相信科学技术似乎能满足他们的任何愿望或理想,导致盲目的科学乐观主义,甚至是“科学万能论”,以科技发展带动的经济腾飞也让不少人在物质世界中逐渐迷失价值取向和善恶是非观念,包括信仰、道德、伦理等等在内的种种传统理念无不受受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挑战,正是对科学主义的某种崇拜导致了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间的失衡。现代科技的发展会否加剧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间的隔阂或不理解?高举两种文化精神价值并举宗旨的人的教育能否真正承担满足人们内心世界平衡的重任?当今教育面临着许多有别于斯诺时代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学科分支细化,教育越来越精细化,知识专门化导致很多人为设置的知识壁垒,同时知识全球化又要求非科学和科学学科交叉融合,建立跨越学科界限的综合知识体系。处在这样一种分化与综合并行的大趋势下,如何培养顺应时代前进步伐的复合型人才,推动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人的教育与两种文化

关于人的教育问题的探讨,必然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斯诺的演讲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早已在六七十年前完成,而另一场科学革命正在人们身边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以至于包括文学知识分子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未察觉它的存在,正如斯诺所说:“我们已开始理解即使是旧的工业革命了吗?而对我们正处于其中的新的科学革命是不是所知更少呢?没有比这更需要去理解的了。”^{[3](24)}这便是斯诺为两种文化问题大声疾呼的主要动因。科学革命标注出具体社会历史坐标,将人的教育定义为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并行的范畴,循着从工业革命到新科学革命的线索,人们终将理解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在人的教育中的时代意义。关于在工业革命背景下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关系问题,有一

位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马克思。身处欧洲工业革命中心的德国和英国，马克思深刻地感受到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巨变和动力，资本主义剩余劳动“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5](292)}与此同时，他也异常清醒地洞察到：在弥漫着科学乐观主义的烟雾背后，看似万能的科学文化正在吞噬人们的文学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破坏两种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社会环境，“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了人的多种多样的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养工人片面的技巧”，^{[5](292)}工厂劳动将工人变成了活生生的机器。马克思的过人之处在于能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洞悉人的教育问题，发掘出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在人的教育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以致产生两种文化的隔阂。

对于科学革命使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分裂的事实，斯诺在演讲的科学革命一节中说到：“我以前说过，极具教养的非科学知识分子不能应付最简单的纯科学概念，对应用科学甚至更差。”^{[3](25)}即使在代表科学文化的科学家群体内部，也有纯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之分，并且，斯诺认为他们之间也有差异。绝大多数纯科学家在当时对生产工业仍然是极端无知的，他们对工程师和应用科学家的反应比较迟钝，只关心纯学术问题研究，而想当然地认为应用科学是二流头脑的职业，等等。^{[3](26-27)}当时社会中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的隔阂由此可见一斑。究其原因，在于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都缺乏某种洞察行业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斯诺看来，是他一生中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育之一。

斯诺重新回到教育话题的讨论，并提出“我们为什么跟不上科学革命？为什么别的国家做得更好？我们将如何面对未来，包括我们文化的和现实的未来”等问题^{[3](28)}，通过对比分析英美苏三国的不同教育策略和理念，他期待人们从中得到启发。当时的英国奉行培养少数精英的古老教育模式，儿童接受教育至18岁的比例远小于其他国家，且教育一直保持着追求专业化的民族热情，在18岁时，专攻科学的学生所知道的科学知识比任何地方的同龄人都多，但在其他方面他们知道的并不多。美国的教育策略不一样，是一种全民接受教育到18岁高中阶段的松散的普及教育形式。大部分美国高中生都能上大学，大学教育的专业化程度比英国更低，但好学生仍然能保持良好的创造性探索能力，只是在博士阶段才突然变得严肃认真起来。苏联高中教育的专业化程度介于英国和美国之间，高中阶段注重通才式教育，而在5年制大学的后3年专业化程度甚至超过英国。^{[3](29-30)}由此观之，两种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学术分科，在教育策略上集中表现为

知识专业化程度高低和教育普及范围。自科学革命以来，学科版图上“最具标志性的变化，从外观看采取了两种互相矛盾的方式：一是在学科内部萌生了许多越益专门化的子学科；一是在学科之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综合性探索”。^{[6](38)}文学文化是人的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文化奠定人的教育发展的基石，二者既有保持不同学科分类的必要，又存在相互沟通的可能，片面强调某种文化，或者人为促使文化对立和隔离都不利于社会 and 人的发展。人的教育应是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和谐并进的发展过程，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也不能缺少文学文化的宏观支持，使科学技术在社会伦理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健康发展。因此，沟通文学和科学两种文化的通识教育是融会两大文化体系的有效途径。

19世纪70~90年代，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对学生的个人智力和志趣的不同未引起注意，大学应该给予学生在学习方面的选择自由，因此他在哈佛推行选修课制。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秉承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捍卫学术自由，对当时盛行美国的实用主义提出批评，反对大学过分专业化，把整个大学分为生命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四个部，并强调部际之间、院际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使之成为学生必须掌握的四大学科领域的基本知识^{[2](144)}。1978年，哈佛大学想从课程改革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核心课程报告”(Report on the Core Curriculum)。杜克大学于1997年成立了专门的课程评估委员会，在调查、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杜克大学新的课程改革报告“课程2000(Curriculum 2000)”，涵盖四个教育目标：知识领域、探究方式、重点探究和能力培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作小组制订了“北”类(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其中两门为写作课程)、“南”类(工程、健康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和沟通“北”“南”的“桥”类课程，包括1门定量推理以及3门外语课程，使学生形成横跨人文和科学大类之间的复合型知识体系^{[2](145-146)}。

反观我国的教育理念和策略，近年的大学教育改革实践表明，通识教育观念已逐渐转入具体改革实施阶段。不少以理工科为主的大专院校开始重视文学文化建设，高校专业设置注意跨越文学和科学文化的专业比重，课程设置也要求学生适当选修跨界知识，以学分制作为学生整体评价和考核标准等，都是对转换教育思想及改革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同时，文学文化和道德标准的建立和内化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转变教育观念和模式并非一朝之功，人的教育问题与社会

经济文化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决不能孤立地看待教育问题。已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对中国教育发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值得中国教育界思考的一道艰深命题,探讨这一问题将直面当前中国教育中的一些主要问题。有学者尝试回答“钱学森之问”,对比分析了中西教育的差异表现,及其背后隐藏的不同民族文化根源。书中提到,“对中国教育和学术影响最深刻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思想。西方学术界更相信的是‘种瓜得豆,种豆得瓜’。他们的学术研究不仅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而且也做到了‘种桃开出梨花香’”。^{[7](228)}笔者无意褒贬中西教育,唯以认真观察,冷静思考,提出某些个人见解,以期抛砖引玉。

三、两种文化碰撞下的和谐教育观

大学教育无疑是个庞杂的问题,教育问题牵涉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制度、文化意识形态、人文科学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复杂关系在教育领域的集中表现。大学扩招使高等教育逐渐褪去精英教育的光环,让更多莘莘学子实现大学梦想,有效地提高了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产业化对拉动内需及刺激消费也起到一定效果,但大学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问题:一是学生的自主阅读习惯较弱;二是专业壁垒阻碍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沟通;三是教育的浮躁情绪和功利化。笔者充分认识到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及教育改革的艰巨性,仅希望凭借管窥之见,从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的碰撞中浅析和谐教育观的要点。

第一,以二元化自主阅读激发学习能动性。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可追溯到孔子时代,孔子提出“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的治学戒律,提倡学生对老师的顺从意识,几千年来,绝大部分学生都沿习这一传统,很少有直抒己见的例证。这一思想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统一,但学生的想象力、思辨力和创新力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不利于培养学习能动性。学生自主能动性的不足容易导致其缺乏学习的精神动力,造成学习目的和方向感迷失。精神动力应属于文学文化范畴,需要崇尚文学文化气质的社会氛围。获取精神动力的最佳方式是阅读。据笔者的观察,西方教育更强调学生的自主阅读和独立思考能力培养,而当前国内教育在培养学生阅读和思考能力方面的成效还略显不足。阅读应该是精读和泛读相结合的二元阅读模式,通过精读中西文学经典增强文学气质,明确价值目标,通

过泛读跨学科材料拓展眼界,训练自主思考能力。广泛阅读能平衡文学和科学气质,发掘兴趣点,兴趣是自主学习的起点,兴趣阅读使学生明确学习动机和目的,解决“想要什么,为什么需要,怎样去实现”等问题,逐渐释放学生的学习压力和束缚,获得自主学习能动性,进入“阅读—兴趣—学习”的良性循环,体现和谐教育理念模式,最近被中南大学聘任为中国最年轻教授级研究员的在校大学生刘路就是最佳例证。^[8]

第二,以本科通识教育沟通文学和科学文化素质。在国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只能在有限范围内选择个人感兴趣的专业,如考虑专业的就业前景因素,专业选择面还将进一步缩小,而目前大学文理兼招的专业数量仍然有限,这就意味着过窄的专业选择面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学生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和发展,不少学生被迫学习专业知识,导致消极被动的学习态度,成绩不尽人意,形成某种恶性循环,无法体现大学教育的意义。虽不能说此类现象非常普遍,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学专业设置与高考文理分科相适应的思想似乎在文学和科学两种文化间筑起一道隐形屏障,隔阂彼此。目前,虽然大部分大学都开设有一些跨专业的选修课程,但学生参与学习的时间普遍较短,自主性研究机会较少,学习难以深入,尽管某些大学为学生提供第二学位的学习机会,尽量满足学生跨专业的学习意愿,但这类做法对高校的学术水平和师资素质要求较高,难以形成规模。相较之下,美国的大学通识教育模式或许值得我们借鉴。以笔者在美国的亲身观察来看,多数美国大学在本科阶段最初的两年或全部时间里是不划分专业的通识教育,为大学新生提供依照人文和科学类别划分的课程目录,并为学生选派课程选修导师,指导新生按学校要求、结合个人兴趣和特长,有计划地选修人文和科学课程,合理安排学习计划。学分修满后,学生可依据课程成绩和个人意向自主选择学习专业,或根据人文和科学类课程学分的选修比例颁发毕业证书。本科阶段是人学习历程中的黄金时期,应该为个人的进一步学术研究或事业发展夯实学习基础,因此,以通识教育为实践基础的平衡跨界学习模式应该是实现人文和科学文化和谐发展的途径之一。

第三,以教企分离改革戒除浮躁情绪及功利化意识。教企分离改革的含义是指将大学教育与大学办学的产业化趋势分离开来,即针对大学产业化后产生的教育浮躁情绪和功利化意识所引发的思考。首先,近年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倍增,原本有限的教育资源被逐渐稀释,一段时期内,大学试图通过合并

重组方式扩充教育资源,实现教育产业做大做强,但在实践中不免会产生一些利益问题,使得某些大学与教师产生浮躁情绪和教育功利化倾向,出现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学术信任危机等不良风气,影响了大学教育的社会形象。其次,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大学教育的社会作用可引用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的界定,以向社会传输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精神为目的,从人文和科学主义角度,对社会价值或经济发展提出独立而公正的批评监督,确保他们能朝着合理方向发展。大学教育与社会和经济环境应保持合理距离,克服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良现象的影响,坚守独立客观的监督引导立场不动摇。再次,教企分离模式已在欧美大学得到广泛实践。欧美大学的教育管理模式中多施行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分离的原则,教学体系在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且以教授或学术委员会为其绝对权威,教授可自主决定课程开设、教学、管理及评价各环节,并接受校学术委员会监督,教学岗位均按需设定为聘任制,教师流动性强。教学与行政人员职责区分明确,教授虽可兼任行政职务,如系主任、院长、校长等,但行政权力较弱,多体现为协调教学过程,更好为学生服务的保障手段,而且,行政人员为学生和教学服务的意识较强。在保障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前提下,大学形成教学与科研相长、师生良性互动的氛围。因此,教企分离不失为促进大学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并肩发展的途径之一。以加大教育支持力度为后盾,大学教育将逐渐脱离产业化模式,通过保障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生活待遇,遏制浮躁

和功利化思想蔓延。

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思想是人们对德性、教育和人的福祉追求,“同一时期的希腊哲学还发展出人文主义的另一思考的进路,这就是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潮”。^{[9](122)}近代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使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兼备的思想逐渐成为教育理念,通过重温斯诺的里德演讲,希望人们能重视文学文化在科学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地位,为文学和科学两种文化的和谐教育提供某些启示。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中国文化的重建[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
- [2] 蒋洪新. 大学的“通识教育”与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6): 144.
- [3] [英]C. P. 斯诺. 里德演讲, 1959 年[C]//陈克艰, 秦小虎, 译. 两种文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 [4] F. R. Leavis. Two Cultu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 P. Snow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3.
- [5] 张楚廷. 课程与教学哲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 [6] 斯蒂芬·科里尼. 导言[A]. 陈克艰译. 两种文化[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 [7] 石毓智.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 探讨钱学森之问[M]. 北京: 科学出版社出版, 2012.
- [8]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3/30/13547898_0.shtml.
- [9] 石敏敏. 希腊人文主义——论德性、教育与人的福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Thoughts on the harmonious education mode integrating humanistic and scientific spirits: Based on Snow's Two Cultures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HOU Qikun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C.P. Snow made the speech on the topic “Two Cultures” in UK in 1959, pointing out the gap and isolation between two cultures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in British society and calling on the society to regain the intercultural attitud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British people to take positive ac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can create a literary or humanistic atmosphere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hib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henomenon of impulsive or utilitarian education. In this way, present Chinese college education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it. The cit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a popular educational mode widely applied in modern western universities, is supposed to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harmonious education paradigm shift advocating both the literary culture and scientific culture.

Key Words: C.P. Snow; literature; science; culture; education; harmony

[编辑: 胡兴华]